

民族记忆·胜利之上 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特别报道

专访抗战史专家岳思平：

我们需要胜利教育

在中国民众的历史教育中，关于抗战，有爱国主义教育，有革命传统教育，更有国耻教育，但唯独缺少了胜利教育。

“这届领导人非常重视抗战纪念活动。”8月30日，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此前的全民抗战77周年纪念活动，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七七”当天参与官方纪念，而岳思平当时也在活动现场。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刘志浩

“9·3”抗战纪念日 曾经未受重视

齐鲁晚报：您讲过，这一届领导人非常重视纪念抗战等活动？

岳思平：在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7日下午经表决通过了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设立每年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再者，习近平总书记今年7月7日出席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日，也是首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这一天参与官方纪念。今年5月，习总书记还和俄罗斯总统商定，在明年，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两国举行庆祝和纪念活动。

齐鲁晚报：以前曾有过的规定，指出：“每年9月3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因为按照惯例，胜利纪念日的前一天应是战争的结束日。虽然日本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但正式签字投降是在9月2日。

岳思平：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曾规定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改变了原来的规定，指出：“每年9月3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因为按照惯例，胜利纪念日的前一天应是战争的结束日。虽然日本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但正式签字投降是在9月2日。

不过，政务院设立的纪念日，改革开放以后并未引起人们重视。而此次设立纪念日、国家公祭日则是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比如苏联设立了卫国战争纪念日，即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领导人每年都要参与纪念。

通过设立纪念日、公祭日，我相信以后普通民众也会越来越关注抗战，从而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也更加珍惜和平。

更重要的是，在纪念抗战胜利的同时，也能让我们意识到，无论困难多大，我们中华民族都能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前行的困难克服掉。中华民族是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只要团结一致，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到个人，过去的抗日志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牺牲，如今，只要个人努力，是能创造幸福生活的。

百团大战应予以肯定

齐鲁晚报：我们从小就学习抗战史，但随着经历那段历史的人逐渐老去，现在很多人提出要重新看待抗日的历史，已经有不少研究者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去书写抗战史。

岳思平：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但目前有几个问题大家容



8月30日，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接受本报专访。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摄

易忽视。比如1937年7月，是全面抗战还是全国抗战开始呢？现在很多人说，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全面抗战是相对于片面抗战而言的。其根本区别是指参加抗战的成分不同，焦点是依靠人民群众还是单纯依靠政府军队抗战。

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选集》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时隔4个月，即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时，仍“是处在从片面抗争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片面抗战已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据此，1937年卢沟桥抗战只是全国抗战的开始，而不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齐鲁晚报：一段时期内，在评价“百团大战”上存在争议，现在如何认识？

岳思平：百团大战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充分肯定、基本肯定、全面否定和重新基本肯定的阶段。其中全面否定是出现在“文革”时期，我认为还是应基本肯定。

共产党发动的百团大战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主要交通线，沉重打击了日本华北方面军推行的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和碉堡作锁的“囚笼政策”与嚣张气焰，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抑制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也鼓舞了全国军民。

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考察百团大战，把它与华北敌后抗战，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起来看，百团大战对抗战胜利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应该予以基本肯定。

“抗战”与“甲午战争”不可同日而语

齐鲁晚报：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作用近年来也被重新评价。

岳思平：中国抗战之所以取得胜利，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日本面临的对手已不再是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政府，也不是卖国“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北洋政

府，而是一个空前觉醒起来的中华民族。

在抗战方面，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国民党是具有两面性的。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具有妥协性的。而抗战初期，共产党就提出全民族抗战路线，且意志十分坚定。杨靖宇1932年受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他率领东北军民与日本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他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敌人周旋战斗至壮烈牺牲。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作理论准备。

齐鲁晚报：到底该怎么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

岳思平：关于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作为共产党来说，从来没有讲过国民党军队不抗战，只是说其片面抗战或消极抗战。即使消极抗战，也是分战略阶段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基于国共合作而建立的，国民党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和代价。比如在主张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上，虽然国民党后期有些妥协，但国共还是达成了一致。

1935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又在《论持久战》中做了系统阐述。在此期间，处于全国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于1937年8月20日在《战争指导方案》中，也明确提出“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在持久战中消耗敌人。

我们应该承认，总体上，国民党抗战性大于妥协性，并且发挥了重大作用。

国民党老兵的贡献 应得到尊重和关注

齐鲁晚报：如今社会上对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岳思平：确实应该关注，站在全民族的高度上，他们毕竟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关注。中国共产党现在非常肯定和尊

重国民党在抗战作出的贡献。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就在讲话中，赞扬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其中前四位为中国共产党将领，后四位为中国国民党将领。

而在今年卢沟桥事变纪念活动中，习近平和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国民党老战士林上元还有少年儿童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齐鲁晚报：这其中有什么政治意涵？

岳思平：一者，抗日战争胜利是在国共合作下完成的，这是对历史的承认；二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齐鲁晚报：现在中央如此重视抗战纪念活动，现实意义在哪里？

岳思平：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不仅赢得了自身的独立解放，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和人类和平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通过纪念，一来，我们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二来，抗战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点。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齐鲁晚报：这与当下中日关系紧张有关吗？

岳思平：纪念活动提醒我们，我们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悲剧重演。我们要努力发展好自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上接B01版)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代价后，这个古老的国度，艰难地收获了失去已久的自尊和自信。

不是一个人的纪念

69年一晃而过，现代人已经很难想象当年人们庆祝胜利时的盛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段艰辛的具有特殊意味的历史，会被人淡忘。那些当年历史的缔造者们，也绝不应该被这个时代所忽视。

“今天的我们还能做中国人，是因为他们在当年选择成为中国魂。”

贾元良的博客上挂着这样一首与抗战老兵有关的诗。这位被称为民间抗战史“发烧友”的北京汉子，是长城抗战网的发起人

1997年，这个60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进行了一趟“一个人的抗战纪念”之旅。

是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悼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一幅幅直观的照片和文字说明，极大地震撼了当时33岁的贾元良。

不过，与活动主办方预想中的人群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半个月下来，参观者只有3万余人，大部分都是来京旅游的外地人。

“我深深地陷入一种沉默，一种刺痛，一种从未有过的惭愧。”贾元良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

贾元良决定采用徒步行走的方式，来纪念这段“决不可忘记”的历史。

当年9月18日，他身着印有“富强中华9·18—12·13徒步行字样的T恤”，从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位于沈阳东郊柳条湖的“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开始启程，经辽宁、河北、山东等7省市，行走1500余公里，经过82天的跋涉，于1997年12月8日14时35分，到达了目的地——位于南京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一路走来，贾元良拜访了抗日战争期间的见证者，凭吊抗日战争先烈，搜集日本侵华史料，以此重温抗战历史。但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他问过的路人当中，没几个人能确切讲出“12月13日”是个什么日子。

“我一字一顿地告诉对方：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的忌日。”贾元良说。

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这些年来，随着对那段历史了解的深入，贾元良的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宣传，而是把更多经历投入到整理史料，参与关爱抗战老兵和日军性暴力受害女性的具体活动中去。

这些受害者多已年过九旬，且生活贫困潦倒，只会一年比一年少。但他们身上历史的印记，却从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

这些年，贾元良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者，其中有关爱老兵志愿者、抗战研究者和一些老将军和老兵的后代。“大家的目标都一样，都是为了让那段历史能够真正深入人心。”

2009年起，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历史，贾元良成立了长城抗战网。

2012年，他和另一位同伴作为发起人，与北京市希望公益基金会建立了中国抗战文化基金，开展关爱抗战老兵，传播抗战文化等开展公益活动。

“抗战老兵需要人们的关注，再比如除了设立国家级纪念馆外，最好能有国家级的抗战胜利纪念碑。”8月2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贾元良对设立国家纪念碑的事做了再三强调，而这一呼吁，自5年前便已开始了。

在他看来，设碑的重要意义之一正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慷慨悲歌的历史。

今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中，有着类似的表达，抗战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果说参与和推动者的作用在于创造历史，那么传承者的作用便是为了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同样是在创造着历史。

“请你们呼吁一下，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希望每个老兵都能佩戴着属于他们的军功章。”采访结束后，贾元良又特意打电话叮嘱记者，“因为军功章是对这些老兵们功绩的最好认证。”